

湘江观潮



永恒的光

杨开慧：
命运掌握在穷苦人自己手里

王杏芳

这个丰富的世界，曾经有一群青春的她们走过。在那凋敝残破、民不聊生的腐朽旧时代，她们流下的鲜血与泪水，已化作漫天的芬芳与美好；她们的音容与笑貌，与鲜花盛开的春天融为一体，永远年轻，永远生动。

为信仰献身是光荣的



缪伯英

1920年11月。霜降已过，立冬将临，北京城里寒风肆虐。

东城区沙滩北街边有座4层楼房，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型，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在萧瑟的季节，显得格外鲜艳。这里，便是北大红楼。

进得门厅，穿过一楼右侧长长的廊道，至尽头东南隅，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办公室两间房，外间会客，里间办公。而今天，里间房成了会客厅，学生们团团围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昂着头，听先生讲话，个个神情激动。

这是我最亲爱的学生，也必是我最强而有力的拥护者。情感的潮水不由在李大钊心中起伏，漫溢而上，润湿了他的眼眶。这段时间以来，他过得颇不平静。

七个月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他会见了共产国际派的秘密代表维金斯基。两双跨越国界的手握在一起的刹那，李大钊组党的信念愈加坚定。他掏出笔来，亲自修书一封。维金斯基揣着这份滚烫的信笺，即刻赶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八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率先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十月中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李大钊每月将捐出个人薪俸80元，作为各项工作之用，这是他月收入的一半。

但在不久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裂缝开始出现。这主要来源于李大钊欲争取的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种种分歧已给工作开展带来诸多不便，令李大钊最终失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从骨子里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一系列矛盾发生以后，六位无政府主义者“和和气气”集体退出北京共产党小组。

李大钊声音略显嘶哑，这是连续多日失眠和忧虑所致。毫不相瞒说完这一切，才打住话头，手臂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他眼前举了起来：“先生，我愿意！您吸收我进入共产党小组吧！”

这其中，有一只举起的手格外白净和柔弱，但又显出一种非凡的坚韧。这手，属于房间里唯一的一位女同学。

“加入一个前途未卜的初生组织，在严酷的现实背景下，不代表享乐。”李大钊走到屋子中央，目光投向每一位同学，他有必要与义务把面临的困难与危险据实相告，“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更多的奉献，意味着更多的牺牲。可能会颠沛流离饱受亲人分离之苦，也可能被反对派们投进黑牢遭受非人折磨……”

“先生，我想说……”女同学跨前一步，表情坚毅，“您说的一切，没有任何可怕！人大不了一死，为了信仰而献身是最光荣的事情！”

“好！有青年在，就有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李大钊被学生们的激情深深感染，一扫连日来的孤愤与郁结，“为了未来中国的平等、民主和公正，为了下一代可享福中之福，我们需随时准备吃苦中之苦，随时要舍得出最大的代价。我李大钊愿意吸收诸位同学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员，以此充实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

这些同学的名字分别是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宁等，其中的女同学是去年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从湖南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缪伯英。

这天始，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也是53位第一批党员中唯一的女同志。



杨开慧

叫剥削！”

“没有办法呢，地主老财们有团丁，有枪，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一个年长些的农民坐在台下叹了一口气。

一个青年农民却倔强地站了起来，说：“先生，您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吧？”

杨开慧四处一望，角落里有些零碎的竹片，她拾了起来，握成一把：“一根竹片人人都能折断，一把竹片就折不断了。只要我们穷苦人团结起来，什么军阀、土豪、地主老财，统统都能被打倒！”

“我明白了！”聪慧的细妹子也站了起来，“我们的爹娘都以为地主给了我们地，财东给了我们钱，是他们养活了我们。事实上，是农民养肥了地主老财，他们是寄生在我们肚子里的蛔虫。”

“讲得对！”杨开慧反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说：“人字两边分，地主是人，农民也是人。没有农民的苦，就没有地主的富；没有农民的忙，就没有地主的粮！”

在万籁俱寂的乡村夜晚，杨开慧的声音分外响亮，犹如清脆的钟声。

这是1925年的9月，就在这月，因为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带着妻子第一次回婆家的毛泽东先行离开。杨开慧留了下来，继续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直至12月16日离开，奔赴广州新的革命战场。



向警予

孩子，希望你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

1927年4月，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家，向警予唱着自己编的儿歌，哄着3岁的儿子蔡博入睡。只有这个时候，儿子才会乖乖躺入她的臂弯。

呱呱坠地后，蔡博常年见着的人除了奶奶与姑姑，就是他的几个小姐姐。才来的女人，虽然面容清秀、眉目舒朗，但总之陌生。他抗拒她的所有拥抱。

葛健豪走了进来，这位曾以55岁高龄与她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大义婆婆，见着向警予脸上的泪痕，不由心疼：“三年没见面了，你又瘦了许多。这次回来，多住几天，熟悉了，孩子就会亲近你的。”

第二天，在葛健豪坚持下，一家老小来到城里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全家福。

公公蔡荣峰坐着，葛健豪、向警予、蔡庆熙和女儿刘昂分列两旁，还有三个小孩子：李特特、蔡妮和蔡博。蔡妮是向警予的大女儿，李特特是蔡畅与李富春的女儿。

蔡博想与姑姑站一起，但被姐姐蔡妮抢了先。向警予微欠身子，把宝贝儿子揽在怀中。留着短发，露着光洁额头的她，笑得像春天一样灿烂。也许那一刻，她的心情是百味杂陈的。曾几何时，她与这个家庭的优秀儿子蔡和森由于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结成了坚定的“向蔡同盟”。但这一切已成过往，如同当初坚定的爱一样，当情感亮起红灯时，他俩也选择了坚决的分手。

不管怎样，这个瞬间是她难得的幸福时刻，温馨、温情、还有弥漫如暖气般的亲情包围着她，她的笑，是内心深处跳出的快乐音符。

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蔡博小手含到嘴里，皱着眉头，却有满脸的不情愿。

向警予终究没有多住几天，第三天，她就离开了孩子们。才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她，被党中央派遣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从事地下宣传工作。那里，革命浪潮滚滚；那里，一首有关生命与信仰的悲壮乐章正等待着她去谱写。



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吴师傅

贺为民

认识吴师傅，纯属偶然。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从涟钢转战湘东参加钢铁大会战。离开涟钢的前一天，人事部门的老肖告诉我：“你运气好，正好有司机来厂里运钢材，你可坐他的车经长沙去茶陵。”

翌日一早，我就背着铺盖卷儿来到指定的地方。老肖已在那里等我，他指着正在擦拭车辆的中年人对我说：“小贺，今天你就坐吴师傅的车去茶陵。”

其实，在矿里，我早听了许多关于吴师傅的故事，“为了矿山的建设，吴师傅把命都豁上了！”

吴师傅出生于贵州省榕江县侗家山寨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共产党把这个侗家孤儿从苦海中救了出来。他感恩共产党，18岁就报名参加志愿军当了一名汽车兵，并在部队入了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转业到桃林铅锌矿当了汽车队长。

1971年初春，吴师傅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钢铁大会战，从条件优越的桃林来到偏僻的湘东，在当地山沟里一位农民屋里临时安了家。

刚刚破土动工 of 湘东铁矿建设工地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住房，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吴师傅一到矿里，来不及安顿，就开着车奔驰在那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大山岭矿井急需水泥预制块护顶，一个班只能运三四趟，他每天坚持运五至六趟；二三〇中段急需碎石打混凝土，一天只能运六七车，他每天坚持运八至十车；节假日有的司机回家了，他不休息去顶班……开车10多年，积累轮休400多天。

1978年4月，矿里决定吴师傅改开救护车。他深知开救护车麻烦事多，时间性强，责任重大。可他还是那句老话：“党叫我干啥就干啥！”

他得到矿里同意，在床头安了一台电话机。无论炎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即使三更半夜睡得正香，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立即披衣起床出车。有时刚把饭碗端到手，电话来了，他马上搁下碗筷去送伤病员；有时晚上看电影，他刚坐下，广播一喊，他立马起身走向车库……1982年“五一”节中午，吴师傅回家刚端起碗吃饭，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个中毒病人，必须立即转送茶陵县人民医院。他放下话筒就要走，妻子埋怨说：“连过节都不能吃顿安稳饭。”吴师傅说：“救人如救火，我耽误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钟痛苦，多增加一分危险。”他迅速将车开到医院，帮着把病人抬进急诊室。医生看后说：“要是再迟来几分钟，就晚了。”看到病人化险为夷时，吴师傅舒心地笑了。

有一次，吴师傅送身患重病的矿工刘湘桂去医院，医生说需要输血抢救。吴师傅立马撸起袖子，将自己的血液输给汉族兄弟，医生给他抽了200CC，他还埋怨医生抽少了。当医院按规定发给输血费时，他说：“为了抢救汉族兄弟，献一点血算得了什么！”医院只好让人转交吴师傅，而他却把这些钱买荔枝、牛奶，送给了住院的4个汉族兄弟。

1982年3月，吴师傅被矿工会安排到北戴河疗养。美丽的海滨风景，迷人的西山名胜，没能把他的心拴住，规定疗养期45天，他提前半个多月就离开了。路过北京，也没有停留去看一看早就向往的首都风貌，就风尘仆仆地赶回矿里上班……吴师傅就是这样一个心里只有党、只有工作、只有他人的共产党员。

我调离湘东铁矿后，再没见过吴师傅。只记得他的大名叫吴顺才，是上世纪90年代湖南冶金系统著名的劳动模范。